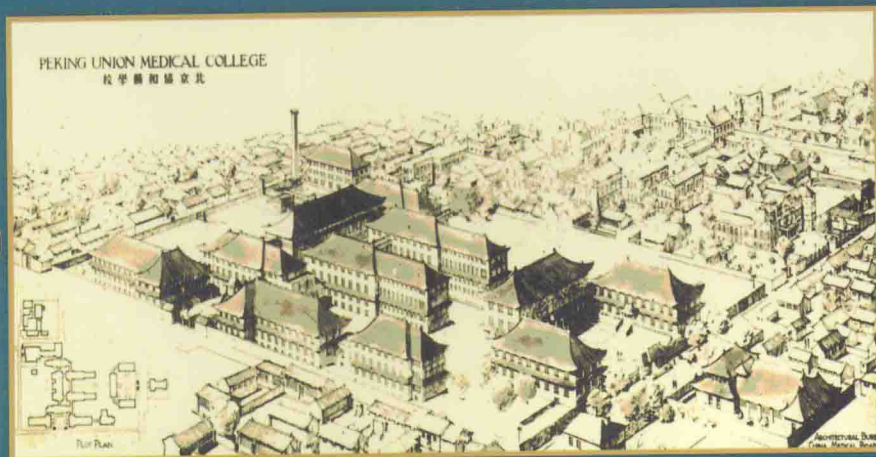


100
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洛克菲勒基金会 与协和模式

[美] 玛丽·布朗·布洛克 著
张力军 魏柯玲 译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Mary Brown Bullock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014060541

R-4
03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美] 玛丽·布朗·布洛克 著
张力军 魏柯玲 译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747938

R-4
03

1320303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 (美) 布洛克著; 张力军, 魏柯玲译.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4. 6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ISBN 978-7-5679-0089-9

I. ①洛… II. ①布… ②张… ③魏… III. ①洛克菲勒基金会-关系-北京协和医院-研究 IV. ①D711.27 ②R1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4842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y Mary Brown Bullock
Copyright © 1980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ll rights reserved.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本书根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CMB) 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达成的协议翻译出版。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1557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编 著: [美] 玛丽·布朗·布洛克
翻 译: 张力军 魏柯玲
责任编辑: 顾良军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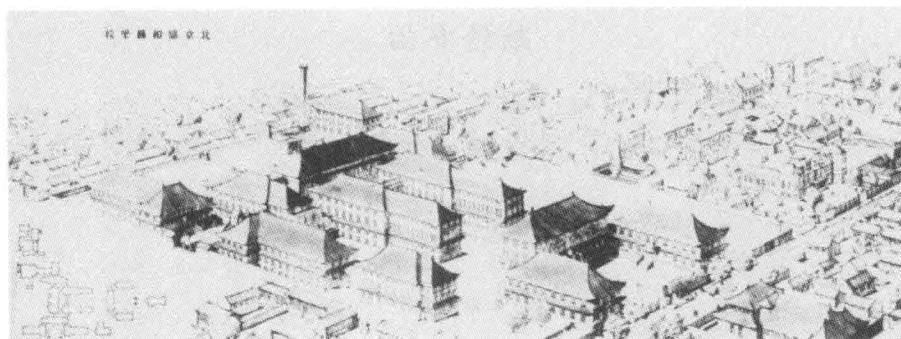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佳艺恒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7-5679-0089-9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献给乔治



建筑师手绘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区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前言

CMB 百年丛书

2013 年 7 月 11 日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过去经常发生的灾难性的疾病也得到了良好控制。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应得益于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及有关机构也在这百年中逐步成长起来。在此科学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最杰出代表即是有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会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也将有益于我们探讨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未来发展。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1914 年成立，到 2014 年，即有百年历史。从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至今，CMB 见证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极其辉煌的医疗卫生史。值此庆祝一百周年之际，CMB 组织翻译了四部经典英文著作，回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 CMB 合作的历史，以飨中国读者。这一套丛书通过对历史人物，机构及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中国在发展现代医学过程中的成就及其相关的争论。其中有三本书集中描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四本书则重点讲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开拓作用。

为了向中国读者呈现这段历史，CMB 访问了很多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他机构的领导者。最终，CMB 的顾问委员会决定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本著作，另外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和达尔文·斯泰普尔顿等科学家、历史

2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学家和学者，他们为书辛苦作序，向中国读者推荐这四本专著。感谢刘德培教授专门为丛书题字。

还要感谢参与翻译丛书的特别顾问达尔文·斯泰普尔顿、梁其姿、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张力军、张霞、蒋育红；译者韩邦凯、魏柯玲、闫海英及参加翻译工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师生等；CMB的工作人员张烨、李曼玉、阮志贞等。

董事会主席 玛丽·布洛克

Mary Brown Bullock

主席 陈致和

Louisa C. Chen

序 言

今年东单三条九号院里的玉兰盛开之际，受布洛克女士之约，为所著《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作序。2014年新年前交稿，及近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华诞，大有长磨洋工之嫌。

洛克菲勒家族发起并由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承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于二十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改革与医院改革之际。办学之初，北京协和医学院像是移植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从落地生根服水土到形成协和模式经历了异乎寻常的进程。

1920年协和董事会通过办学目标明确指出：举办与欧美相媲美的一流医学院，包括本科、毕业后和进修教育。提供科学研究机会，特别是远东特殊问题的研究。传播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培养临床专家、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卫生行政专家。

办学的第一步是招募优秀的教师，韦尔奇认为“选择教师的关键点是其研究能力或者激发研究的能力，这样的人普遍都是最好的老师”。办学之初主要是外籍教师，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希望吸收中国的精英阶层，招募留学回国的具有高素质的第一代医学科学家和医生，并逐步扩大到协和培养的优秀人才，即第二代医学科学家和医生。

协和特别重视选拔优秀的学生，医学预科的录取非常严格。从医学预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到获得博士学位，均有严格的淘汰。强调掌握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同时参与科学研究。学习和研究均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课程设置是育人的关键环节。首次课程设置尽可能遵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模式。此后，内科系增加了在实验室和医院病房的时间比例。协和不断探索“修改美国教育课程，以适应中国需求。”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从1926年起，协和所有学生都必须在第一卫生事务所进行四周的实习，等同于内科外科产科的实习。这是医学教育的一个重大创新，得到了美国医学教育家们的认同。在30

2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年代，一定程度上被复制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其他的中国医学院校也开始注重公共卫生训练。

协和注重科学研究。协和教师自由的科研时间占到学术工作量的一半。吴宪创立的蛋白质变性学说，步达生等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实为重大科学创举。对黑热病、疟疾、血吸虫病、沙眼、营养学及中国药典的研究，为诊治国人病患提供科学依据。教学医院提供了一个把实验室知识转化为实际诊治的场所。在中国大地上孕育了医学科学研究方法与成果转化，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科学精神弥漫在整个学校。研究工作还经常带来中西科学家真诚的合作。

这种探索与合作，还体现在公共卫生领域与社会实践。被称为“医学布尔什维克”的兰安生用超凡的智慧将医学实践和教育方法与中国的巨大需求相适应。兰安生坚持倡导建立城市卫生示范中心；强调公共卫生把社会视为整体；倡导并实施交叉学科项目。兰安生注重培养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代表的领军人才，促进国家认知，进而带来政府的行动。强调政府应该发展社会机制，确保生活条件以保持健康。兰安生的设想在陈志潜和杨崇瑞的革命性项目中进一步发扬光大。陈志潜改造了都市卫生模式，他的河北定县农村卫生体系结构契合了中国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局限，有区别地在整个地区普及医疗保健。其地理配置适应中国农村的生态特征。他培养的乡村卫生员应是赤脚医生的前身。他主张的低水平广覆盖医保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杨崇瑞根据当时中国国情，主张培养助产士，并任新建立的助产学校校长。学校开设三门课程，分别培养传统接生婆，现代助产士和助产项目监管者。学校还设立了儿童健康研究所。杨崇瑞和陈志潜尽管碰到社会阻力和困难，仍坚持不懈地探索与实践。陈志潜强调专业精英必须熟悉当代中国的现实，这一理念具有深远意义。

协和经历三次停办与复校。始终坚持并不断探索和完善办学方针：坚持医学精英教育、实行高进、优教、严出；注重能力素质培养；强调“三高”（即高标准、高起点、高要求）、“三基”和“三严”即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开放办学、博学众长，传扬优良文化传统。时任卫生部的李德全在协和第二次复校时指出，要倡导两条腿走路，即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医学教育。今天，八年制医学教育已在全国

近十所医学院校实施。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模式已经转变为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综合的医学模式。思维模式向系统扩展，宏微并举。系统生物医学应运而生，对医疗服务、健康促进、医学教育、科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协和要站在时代的前列，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为医学科学发展和人类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受家庭影响，布洛克女士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协和也很关爱。每次来北京，她都选择住在协和校园附近的宾馆，品味这个孕育了现代西方医学的中国宫殿，有时间就来协和查询老档案，与我见面，了解协和的状况。她对协和历史研究具有深厚功底。由她著就的《协和模式》字斟句酌，耐人寻味。正像阳春三月看九号院的玉兰，岁岁细数总不清，明春绽放更繁荣。也许像布洛克女士所述，“太平洋两岸许多与协和医学院有关系的人，不会认同我所有的观点。”但愿协和人像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杰纳斯，“可通观东西，既可介入又可远离适应与吸收的过程。”

是为序。

刘德培

2013年12月30日

绪言

我第一次访问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是很久之前的1974年10月，一个灰霾的早晨。那里现在是首都医院（Capital Hospital^①）和中国医学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的所在地。那是我到北京的第一天，还来不及调整时差，5点钟就早早醒来。我急匆匆穿戴整齐，下楼穿过“老”北京饭店（Peking Hotel）大堂，出饭店前门上了长安街，宽阔的林荫大道可直通天安门广场。我没有向那个著名的地方右转，而是左转上了王府井大街北行，这条购物大街此刻空无一人。过了新华书店右转，一个窄巷令我有些犹豫。走过大约一百码生机渐醒的灰墙大院，晨雾之中高墙后面那些饰有绿色琉璃屋顶的机关建筑清晰可见。我到了！

后悔没带一张资料中的老校园图，我试图回忆把角的第一个建筑是否就是生理学大楼，或是步达生（Davidson Black）曾经研究“北京人”骨骼的解剖学大楼。再走几步，我彻底不再怀疑我的位置，我的左侧是通往协和医学院行政主楼前大理石庭院的大门。我知道顾临（Roger Greene）的办公室就在主楼门厅的左侧，一条大理石走廊连着医院后院。站在安静的路上向右看，我发现原来的礼堂似乎刚刚修复。此处曾有风琴声在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奏响。不难想象毕业生队伍走下大理石台阶，穿过精雕细琢的大门，一直行进到似儒家祠堂般礼堂的场景。

我的遐想转眼就被四周的标语和大字报打断了。主要标志牌告诉我

① 北京协和医院曾于1972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反帝医院更名为首都医院。——译注”

2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这里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大理石台阶上方悬挂的大标语牌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小些的标语则写着：“胜利属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人民。”这个大门曾有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 Jr.）、威廉·韦尔奇（William Welch）、顾临、兰安生（John Grant）、刘瑞恒（J. Heng Liu）、陈志潜（C. C. Ch'en）和杨崇瑞（Marian Yang）等人穿行而过，而那个时代早已不再了。这些标语提醒着人们，就在6天前，北京刚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年。

此次和后续几次访京^①，我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在那些与老协和医学院相连的大街小巷徜徉徘徊。我凝视着日渐老去的雕饰屋檐，它们似乎与那些有着明确教学和医疗功能的建筑不甚协调。沿着另外一条路，从王府井开始，经过北京烤鸭店，直到现今的首都医院，我找到了曾住着协和医学院教员的北极阁宿舍和外交部街宿舍，那是20世纪20年代样式的2层砖楼。我不敢肯定是否要走进其中的某座建筑，因为对我来说，这里一直安顿着那些我从未谋面，但却从文章、论文、书信和友人处相识的灵魂。

1975年4月随同一个医学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时，我确实造访了首都医院。我穿过病房，来到开满丁香和迎春花的庭院，成摞的绿瓦告诉我一些中式屋顶即将修缮。这家名声依旧的医院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存在，但我却是在别处发现了它鲜活的遗产。

就在我随同的代表团抵达北京友谊医院（Friendship Hospital）时，五六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等在台阶上迎接。一个秃顶、身高约5英尺的医生率队欢迎我们。他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略带英国口音，自我介绍

^① 作为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工作人员之一，我曾陪同四个科学代表团访问中国：1974年美国地震代表团，1975年美国血吸虫病代表团，1977年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代表团，1978年地震工程代表团。

是钟惠澜 (Chung Hwei-lan)。别人告诉我们他是医院的副院长。钟医生接待了我们一天,参加了我们的晚间讨论和宴会,在北京机场和我们挥手作别。那期间我一直全神贯注地观察和聆听他。钟医生于1929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又赴英伦和美国深造,回到协和内科撰写了大量寄生虫学的文章,解放后还成为《中华医学杂志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的主编 (担任该职直至“文化大革命”)。他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少有的几位医学界院士。无论如何衡量,钟惠澜都是协和医学院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

钟医生急切地想听到从前那些美国同事和教授的消息,他也十分投入地参与了同美国医学家们的几次交流,偶尔还帮助年轻的中国医学翻译找到合适的英语专业词汇。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介绍北京友谊医院的时刻。

他关于医院病理部的介绍并无非常特别之处。他强调的主题——预防第一,农村为主——也是所有我们造访的医疗机构一再重复的。但是知道了他的研究背景,这样的口号便显得更加有力。他充满激情地讲述了一项由他的同事指导并与赤脚医生一道进行的、筛查由肝吸虫引起的华支睾吸虫病的大规模运动。他讲到降低黑热病和肺吸虫病的发病率时充满自豪。前者是一种毁容性寄生虫病,主要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如不救治可以致命;后者则是由吸虫引起的一种肺部感染。这些寄生虫病几十年前就曾在我国北方肆虐。他还同样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医院的实验室,请他的年轻助手们介绍他们的研究。

钟医生并没有提到自己早年在协和医学院豪华的实验室的工作,他那时作为一个年轻的讲师投身黑热病和肺吸虫病的艰苦研究,从而使根除它们的努力在多年以后成为可能。但我记起了1930年代《中华医学杂志》发表的许多文章,回想到他跨越了两个时代的职业生涯,且已成为公共卫生事业师长和领袖的医学科学家。

我也曾于一年前首次访问中国时遇到另外一样生动的遗产。那是在大约晚上 8 点钟的黑暗之中，从北京到西安（Sian）的火车停经定县（Ting Hsien）。视线中仅有灯光昏暗的站台和几支街灯的光芒摇曳于这个 30 年代曾是晏阳初（Jimmy Yen）平教运动（Mass Education Movement）中心的著名县城。同名的定县辖区曾经建成了平教运动之教育、经济和卫生项目的试验区。就是在这里，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毕业生陈志潜创建了与当今中国极其相似的乡村卫生组织，完全由后来称为赤脚医生的普通乡村卫生人员完成。

我没有机会亲眼看到定县今天的模样，但却访问了往南约 100 英里的村庄邢台（Hsing-t'ai）。邢台并不在惯常的游览线路上，但由于遭受了 1965 年那场灾难性的地震，所以我陪同的一群美国地震学家对此地兴趣浓厚。我们走访了该村，在一个尘土飞扬的主要路口伫立着一座毫无特色的小砖楼。一对年轻的男女赤脚医生就站在楼下。另外还有三名公社的赤脚医生当天轮班下地了。卫生中心有两间房，都是泥土地面。一间内有些传统和现代药物，简单的医疗设备和公共卫生宣传材料。另一间内则是一张产床。我们被告知，大部分的接生都是由与赤脚医生一同工作的助产士帮助在家里进行，复杂的情况则要到中心分娩。我立刻回想起了 1930 年代杨崇瑞的助产士项目——该项目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卫生部资助，开创了培训助产士提供此类简单服务的先河。

对我来说，这两位赤脚医生和温文尔雅的钟惠澜博士远比依然在深宅大院之中的老协和更真切地体现着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当下中国医学的联系。我就是从见到钟医生并感受到他在医学研究和卫生领域的领导力时，才开始理解协和高质量培养人员的意义。也就是在这远离定县百英里之地，与这两位赤脚医生交谈之后，我才彻底信服，兰安生、陈志潜和杨崇瑞等开展的一个世纪之久的艰辛辅助医疗培训绝非徒劳。

确实，钟博士只是众人之一；陈志潜和杨崇瑞与中国现代医疗体系的历史关联也仅是一个宏大进程的一部分。本书确要探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长久影响的一个侧面——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起到的作用。为了更恰当评价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现代医疗体系的贡献，有必要对中国医学历史的其他方方面面展开研究，比如教会医学、国民党政权的国家卫生署、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时医疗培训、在延安（Yenan）的医疗服务、1950年代苏联的医学影响以及马海德（George Hatem, or Ma Hai-teh）的作用，等等。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西方医学为背景，考察一个美国慈善基金在共产党的中国（原文如此——译注）成立之前所起的作用。因为仅简单涉及其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农业和乡村改造的支持，所以本书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全部历史。然而，这些方面的努力，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从思想上，都不及它在中国医学领域的投入。同样，本书也不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全部历史，尽管协和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仅在中国、也是在亚洲的象征。已有两部作品介绍协和医学院。学院曾经的注册主管福美龄（Mary Ferguson）在其《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中，对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有过权威的描述。约翰·鲍尔斯（John Bowers）的《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一书，则集中阐述学院的教员、尤其是西方教员们的研究和职业生涯^①。

本书与它们本质上的不同在于以协和的学生为重点，概念上则涉及到协和模式的适当性。我还会偏离协和，专注于其中一位兰安生教授的公共卫生项目，并特别关注他的两名学生的职业道路。所涉话题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着力刻画一个中美机构适应中国环境的探索。

^① 有关这两本书的详情，参见作者发表的评述文章，*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 (August 1973): 689-691.

6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模式

此类研究没有太多模式或者概念性的理论可以遵循。传统上，多数有关两国性机构、美国在海外的文化或知识活动的研究，都专注于输出方（即捐助者）的动机、资金、运作和人事等。而对受益方，这些研究仅限于侧面的观望，双方之间的关系着墨更少。著有《美国慈善在近东》一书的罗伯特·丹尼尔（Robert Daniel），在解释他为什么更关注慈善家及其目标和方法（而非受益方）时，写道：

评价美国的活动对他国本土文化的冲击非常重要而又极为困难。物质上的冲击——食品、衣物和资金等——均可相当精确地记载。

引进新的机构也是同样——如学校、媒体、医院。而在精神上的冲击则难以评估^①。

在此小段中作者3次用到“冲击（impact）”一词。该词多被用来描述西方文明在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力。“冲击”的定义是“碰撞，冲突”，进一步可增强为“冲击物体的打击”。“冲击”这个词有某种突发的、瞬间的和强烈的意味。它的主动性如同“响应（response）”的被动性。资助、项目、人员都应该具有冲击力；如果说它们难于评估的话，至少可以辨别；如果今年不行，起码5年后可以。然而“冲击”一词几乎没有给时间、过程、传播和交互等的微妙之处留有任何余地。

过去我们总是找寻对他国的“冲击”。部分原因是我们把慈善、宗教或对外援助看作是单向的或单边的转让。另外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假设转让的效果可以体现为一种“响应”。将“响应”定义为“回答或反应”，或者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对刺激的任何反应”，这暗示着“冲击”和“响应”之间存在的是单一因果关系。在跨文化关系的领域使用这样的术语有几个错误。第一，它意味着“冲击”的性质决定“响应”的性质。第二，它暗示一个国家有可能对外部影响做出单一和一致的响应。第三，

^① Robert Daniel,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the Near East*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x.

它把接受方的作用贬低为被动的刺激-回应行为。最后，它忽略了演进的时间和变化维度。“冲击-响应”症候决定了输出和接收双方，那么其潜在问题就是它的单一性和单向性。

诚然，指出这些概念上的缺陷远比提出跨文化项目的新方法容易得多。本书后续篇章会考虑洛克菲勒基金会存在于中国的三个不同组成部分——思想、机构和个人。思想是指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医学思想。机构指教育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所包含的清晰的医学训练标准。个人则是那些诠释思想和机构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冲击而是适应；不是响应而是吸收。

后面这些概念是流动和开放的，并不能提供系统的分析指南。适应的含义是“使适合，特别是通过变化”。如此说来，适应就意味着美国的输入，无论是机构的还是个人的，都有可能通过变化和创新回应外国的环境。吸收的含义是“接受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它意味着通过改变和选择性吸收，一种文化或个人自身可以决定冲击的性质。适应和吸收都指向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种时间的演进。

我在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一个思想体系与其机构是否并如何适应中国。我对吸收也颇有兴趣，但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尤其是事关与文化和机构交织的社会之网难解难分的医学。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传统和现代医学的相互作用，更开放地对待中国医学专才，才能全面探索“洛克菲勒”医学在中国吸收的课题。本书的视点有限，人物只限于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之中国项目相关联的中美中间人，并且我把最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一个鲜明的群体——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们。他们并非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就像古时的两面神杰纳斯（Janus）通观东西，既可介入又可远离适应与吸收的过程。

如今，没有哪里比在老北京饭店的天台更适合思考美国文化涉身中